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九二九期 ——  
(二〇一四年二月三日报出)

---

本期目录 (zk1402a)

---

【拒绝遗忘】	在“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上的发言	罗 治·顾 媛
【各抒己见】	致王晶磊老师的一封信	叶维丽
【拷问良知】	再谈良知与责任——评宋彬彬道歉	裕 雄
【直面历史】	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王晶磊
【千秋功罪】	宋彬彬身后的人们	袁 凌
【劫后反思】	良知的拷问 (选载之二十)	孙怒涛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表明 CR 字样。

---

【拒绝遗忘】

在“八五·记忆·反思座谈会”上的发言

• 罗 治·顾 媛 •

(编者按：2014年1月4日，一些在北京经历过文革的“老三届”中学生举行了一次以“反思文革 拒绝遗忘”为主题的讨论会。这里刊载讨论会上的两篇发言。)

罗 治：关于为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经过和我的感悟

我受在座同学们的委托，向大家汇报给卞校长捐款塑像的过程及我的感悟。

一、捐款塑像的过程

2007年8月份两位1965届海外学友沈乾若、华欣提出为卞校长塑像，我们老三届是怎么与他们联合的呢，从我的角度来说还有一段过程。2007年6月10日，师大女附中为90年校庆召开校友志愿者会，我在会上提出应该牢记女附中文革黑暗的一页，建议学校为

卞校长举办追思会。同年8月21日，张育芷、罗文冬和我就这个问题找到王本忠和袁爱俊两位新老校长，袁校长表示追思会不好开。我们说准备捐款给卞校长做铜牌，她提到有两位海外校友的提议，建议我们和她们一起来做。

我们很快与这两位校友取得联系，并成立了塑像执行小组，向广大老校友发出了《关于给卞仲耘校长捐款塑像的公开信》，在随后的两年时间里，我们多次召开会议组织协调捐款塑像的各项事宜，各班的校友利用节假日聚会、校友网、电话、邮件等形式，回忆女附中的文革，反思自己的行为表现。这期间也遇到不少问题，“八五事件”已经过去40余年了，大家的记忆存在不少偏差，有些甚至有所遗忘，加上出身经历各不相同，文革中派性也不一样，所以捐款初期对“八五事件”的观点与看法还有不少出入。执行小组成员开会分析：我们的目的是告慰死者、反思文革，首先应从还原“八五事件”真相入手。王友琴、叶维丽、冯敬兰等校友所写的回忆文章以及胡杰拍摄的“我虽死去”影片在这时起了很大作用（当然也有争论），绝大多数同学看完后，都觉得作为当时在校的学生，对于这样公然践踏人权、违反宪法的暴行没能阻止，负有责任，并深怀愧疚，纷纷捐款表达自己的怀念和忏悔之心。

经过大家的努力，从1959届到1980届18个年级44个班的499位同学和几位老师及校外朋友，共捐款人民币9万余元。参与捐款的所有校友都收到了执行小组设计制作的纪念卡和捐款收据。纪念卡上，卞校长遗像旁题写了两行醒目的诗句：“黄昏血色往事何堪回首 绿地晨曦今朝勿忘反思”

中央美院著名雕塑大师孙家钵先生不收一文报酬（只支付了材料费），倾注心血创作了卞校长的半身铜像。2009年11月18日，铜像被安放在实验中学东楼一层会议室。2011年5月7日，又经过一年半的努力，举行了有50余名校友参加的铜像揭幕仪式。

会后，我们将揭幕仪式及捐款塑像的经过认真编辑成光盘，并于2012年3月7日召开光盘发放会议。这时距离当初动议塑像已经有近五年的时间了。

## 二、捐款塑像活动促进了校友们对文革的集体反思

随着形势的发展，随着同学们的交流逐步深入，大家对文革、对暴力、对人性、对国家体制逐渐展开了思考，大部分校友对“八五事件”的态度也从回避逐渐转变为直面、反思。有的同学说：老三届学生绝大多数不是施暴者，很多同学当时也不在事发现场，或者在场也没有勇气，更没有能力来制止打人，但是这都不能成为漠视、躲避、与己无关的理由。回顾这一过程，我深深感到，我们每一个女附中老三届学生，在对待卞校长之死的事情上，应该扪心自问、拒绝遗忘，反思文革，从自己做起，唤醒良知，儆戒将来。

文革前就从女附中毕业的学姐们不是“八五事件”的亲历者，她们当时早已退休，但通过执行小组成员刘蓓蓓、高宁学姐的广泛联络，有十几个文革前毕业的班级捐了款。特别是高中1965届，她们是铜像的首倡者，也是捐款最多的年级。该届校友高宁是我们捐款塑像活动的总指挥；该届校友郭平英参加了2007年到2011年的全部活动，执行小组开会，都是在她管理的郭沫若纪念馆，她的两个哥哥死于文革，但是她在讨论问题中特别理性。学姐们对文革、对暴力的认识比我们深刻的多，对我们的思想成熟度有很大影响。

捐款人员还包括1973届和1980届的校友，他们是“八五事件”之后入学的学生，但他们主动了解女附中的这段历史，积极参加捐款、写文章谈感想，还专门出钱复制了两千张卞校长揭幕仪式的光盘，发到实验中学后学圈中，扩大了捐款塑像者的范围，我们当然特别愿意让年轻人加入到队伍中，因为我们逐渐老了，今后继续把反思文革的工作做下去，还要依靠

这些年轻人。

由于当时的一些原因，我们并没有主动联系老师们参加捐款，但老校长王本忠非常支持这项活动，并对他在校长任上没有完成这件事情深表遗憾。很多老师也向我们表达了由衷的感动，觉得我们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年轻教师谢薇薇看完光盘后泪流满面，她说她到实验中学工作也有一些年头了，完全不知道女附中还有这么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同时她对我们这些老校友的集体反思行为深感敬佩，她说，塑像安放在学校东一楼会议室，每天都有很多人来开会，凡是看到卞校长铜像的人都会问，这是谁？为什么放在这儿，她是怎么死的？每个听到介绍的人，都为文革中的残酷暴行感到不可思议，希望文革绝不能再发生。

在制作铜像的过程中，很多校外的朋友也对我们表示了大力支持。八中老校友钟里满得知我们为卞校长塑像这件事后，特别为女附中人的独立思考精神、反思忏悔意识所感动，他说，不少学校也打死了校长，有的甚至更为残暴，但都选择了集体沉默，唯独女附中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他还联络知青诗人郭小林写了一首专门献给卞校长的长诗——《悼念一位母亲》，校友们读后大为感动，大家可以从光盘中听到郭平英校友在铜像揭幕仪式上的深情朗诵。在揭幕仪式上，所有的同学都受到了一次深刻的文革教育。有同学在校友网留言：昨天的活动非常震撼，非常成功。几位校友代表的发言，发自肺腑，感人至深。引起大家深深的回忆和反思……虽然大家在文革中的处境不尽相同，但是今天能够直面历史，深刻自省，让我看到了女附中学生高尚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情操，这样的氛围太感人了，也太难寻觅了。只有回到久违的母校，才能得到这样净化灵魂的精神洗礼。

### 三、我的体会和感悟

#### 1、八五事件折射出文革前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教育和历史传统

我常想，面对卞校长备受摧残的残酷场面，打人者怎么能下得去手？卞校长和自己的母亲年纪差不多，所谓揭发批判的那些“罪行”，也根本构不成死罪，是什么动机使这些女孩子丧失人性，变得这么凶残？大家讨论的结论之一就是：来源于意识形态中的政治教育和历史传统。

一是文革前严重的个人崇拜教育导致盲从和迷信，只要有一点“出格”的言论，立刻上纲上线说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就要专政就要打倒”，完全没有法制、没有人权，越左越革命，右了就是立场问题，就是反革命，搞得人人都要表现自己忠诚革命，立场坚定。马克思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性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414页）二是长期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教育，历次运动人为制造阶级鸿沟，制造阶级敌人，今天你斗我，明天我斗你，人人生活在恐惧中，像英国作家奥威尔在《1984》中写到的那样，每天搞“两分钟仇恨”仪式，每月搞一个“仇恨周”，制造敌人、灌输仇恨。仇恨教育造成人性的丧失，不对敌人狠，就不能证明自己革命。“八五事件”那天学生们的表现就是这种教育导致的恶果。

至于历史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农民运动到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之残酷就不细说了。

#### 2、要把八五事件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来认识

现在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说起文革，给人的印象都是红卫兵打砸抢、实施暴力打死人。能把文革中的死伤，包括打死卞校长的责任统统推到当时的中学生或红卫兵身上吗？我觉得不能！丁东曾对我说，文革初期有三张大字报，当时哲学社会科学部（即现在的中国社科院）的吴传

启写的大字报是第一张，比聂元梓的大字报还早两天。当毛泽东选择支持聂元梓的大字报时，就决定了教育系统领导势必成为首当其冲的受害者，红卫兵充当了文革的马前卒，在文革初期起到打乱正常秩序，制造红色恐怖的作用。显然他们是被利用的，很快又被抛弃。

另外，当时的社会氛围就是极左狂热。毛泽东对红卫兵说：“我支持你们”，“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使得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忘乎所以。江青于1966年7月28日、以及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稍早在6月23日的讲话中，都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说：“好人打坏人活该。”这类话语无疑传递了一种信息，促使狂热的学生把打人当成革命行动，且更加有恃无恐。

当时，上边已经决定抛出卞校长：1966年7月份，女附中领导班子就已经被工作组划为“四类”，即属于“敌人”的最坏的那一类，当然应该打倒。邓小平在接见刘进、宋彬彬时也发出了“对于学校的走资派批一两个就可以了”的指示。

此外，也不能忽略坏人袁淑娥挑唆的因素。

我们在讨论中认为，要反思文革，一定要分清主次，发动者、领导者、参与者的作用是不一样的。据统计，1968年开始清理阶级队伍时的死伤人数大大超过文革初期，女附中此时就有四位老师因残酷批斗导致自杀身亡，当时的领导者就是上面派下来的工宣队、军宣队等等。所以我们要用历史的眼光、求实的态度对待文革全过程的暴力武斗死伤问题。当然，无论是行动上还是语言上对别人造成过伤害的人都应扪心自问悔过道歉，但是那些文革中的各级领导者及发动者更应担负责任、忏悔道歉。我个人还认为，对于少数打人者凶残暴戾、丧失人性的行为早晚应该追究，具体操作时，应分清成年人和未成年人的界限。

### 三、反思文革的任务任重道远

在募集捐款初期，校友中也有一些非议。有人说“卞仲耘又不是什么英雄，给她塑什么像”、“文革的话题太沉重，它是我们心里的疮疤，尽量不要去揭它”、“现在很和谐，老提那些伤心事干什么”，还有人建议我们搞一下社会调查，看看到底有多少人关心文革，希望老百姓本分，摆正自己的位置，好好做事、好好做人，不要玩政治。

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出现这些言论，与这些年来没有彻底清算文革“历史旧帐有很大的关系。德国人对自己的历史不厌其烦的反思道歉，我们对自己的历史又做了什么？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屏蔽了文革的历史，所以大家有责任把”八五事件“、把文革的事情讲出来，我们组织捐款塑像，目的就是让大家直面历史，拒绝遗忘，敲响警钟，用老校长的鲜血告诫后人，以期阻止悲剧再次重演。

有人说你们反思了半天，也没有打人者公开站出来道歉。你们反思有什么用？我们说，对文革的反思，是建立在每个人反思的基础上，我们不仅自己要反思，还要通过集体反思给打人者制造氛围、提供机会，让她们自己从内心的惭愧、愤怒和耻辱中解脱出来。这件事看来很难，但我们会继续做下去。南非大主教图图在《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中曾经说过，他理解中国人出于传统文化中保守面子的需要，对道歉可能感到为难。中国如果能够妥善处理往昔的痛苦，就会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国家。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图图这位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只有还原历史的真相，才能达到和解与宽恕。

谢谢大家！

\* \* \* \* \*

顾 媛：

（顾媛：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 6 7 届高中）

原来我没有打算发言，现在想说几句。

“八五”游斗是我们高一 3 班发起的，发起带有偶然性。是谁发起的？主要是高一才来女附中的学生，多数是军干子弟，文革时特别凶。为什么会这样？这要从初中到高中的变化说起。我初中也在女附中，当时班里只有 6 个干部子弟，家长大部分是国务院系统的，虽然也讲阶级斗争了，但班里气氛还是挺好的。到了高中，情况一下子变了，干部子弟共有 2 4 个，学号全排在前面，我是 3 7 号。学校一直是按成绩排学号，后来有个机会才知道，原来自己的入学成绩是全班第二。这些招来的学生学号排在前面，但有些人学习不行，劳动也不行，累一点都受不了。表现是这样，还动不动说自己父母是老红军，干革命时经历了多少危险艰苦，用这个来表现自己有“阶级感情”。她们不能老是落在后面，所以文革中就更要表现。

8 月 5 日那天，有几个住在西边大院里的同学说要斗黑帮，那时工作组撤了，“主义兵”是革命的了，她们也想表现，于是把校领导集中拉到操场去游斗。当时大家都在教室里，我们出身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坐在一起，她们让我们必须去看。我很尊敬胡校长，出于个人感情也想去看，就一直跟着她。胡校长很硬，挨打最多。看着她被折磨得不像样子，我心里痛，但没有眼泪，也说不出一句话。因为两年来我就被剥夺了讲真话的权利，而军训回校后铺天盖地的“红色恐怖”则压倒了一切良知，剥夺了我所有的话语权。我想自己当时几乎处于麻木状态。班里受学校宠的同学要跟胡校长“划清界限”，也有打她的，但看得出来是手下留情。打人厉害的，很多是高中才招到女附中的。以后文革稍微平静一些，这些人就不回学校了，再也不露面了。

我们班同学之间也互相斗，一切都按出身站队，分成红卫兵、红外围、黑五类等等，再也没有正常的同学关系，大家彼此心怀芥蒂，互不往来。所以现在根本没有高中班的聚会，只有初中的。高中同学全散了，没有两个人在一个地方插队的，大部分人多年不联系，学校有活动也不来了。

我学习一直很好，表现也好，但自从 1 9 6 4 年搞阶级斗争后，一切都变了，变得必须不断写材料骂自己的父亲、母亲，骂轻了还不行，按照《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要上升到官僚资产阶级来认识，一个劲给父母、给自己上纲上线斗私批修，否则就不能入团，心里很有挫折感。到文革时已受伤害两年了，所以反倒能够冷静一些，当个旁观者边看边分析。插队后到了社会最底层，把许多事情看得更透了，才把自己彻底解放了。

我觉得，当时很多事情都不能完全归咎于个人责任，像“八五”那天打人最凶的主要是初二的学生，连我们高一学生在内，还都是未成年人。她们为什么会这样疯狂，没有人性？恐怕从社会背景去分析更清楚些。

□ 原载《记忆》第 1 0 6 期

~~~~~  
【各抒己见】

致王晶垚老师的一封信

• 叶维丽 •

2014年1月24号

王叔叔，

您好，请接受维丽从波士顿对您诚挚的问候。我因远在海外，以这种方式与您联系，希望您能见谅。

想来您已经听说最近女附中一些老三届学生和老师们的见面会，会场里置放着女附中五百余位同学集资为卞校长做的塑像。我不是个轻易会激动的人，那一天我感到了多年来久违的精神升华。

如果我记得不错，2006年夏天后我就没再和您见过面，心里有很多话想对您说。我会一点点慢慢道来，也请您找人帮您慢慢地读，也许要分几次来读。

首先想问候您的身体。您已年逾九十，记得心脏也不甚好，不知您近来身体状况如何？我和于羚常挂念在心。

也许您还记得，我第一次到您家探访是2001年秋天的某日。那天到访的由头是为一部纪录片找卞校长的照片。老实说，我很早就想登门看望您了，但是有心理障碍，找照片给了我看望您的理由。

66年8月5号那天我不在场，第二天广播里“死亡通告”中“死了就死了”那句话给了我极深的刺激。您的二女儿王思是我小学同级同学，“八五”后那些天我不断在想，不知王思怎么样了？

1980年代我赴美读书。某夜，我从梦中惊醒，原来是做了个与卞校长之死有关的噩梦。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做噩梦。

1993年，我写过一篇小文，叫“三个场面和一篇文章”，记述了女附中“八五事件”、66年8月10号新华社游斗“黑帮”（我父亲也在其中）和8月24日深夜老舍投湖自尽的“三个场面”，“一篇文章”则是毛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27年发生在湖南的农民运动和四十年后发生在首都北京的“革命暴力”是有关联的。那篇小文无处发表，我曾给李慎之叔叔读过。

90年代后半期，在全球冷战“结束”的背景下，我因为对成长在“毛泽东时代”有许多困惑，遂邀请一位老三届朋友共同作了一个口述成长史。这本书近年出了中文版，书名叫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年）。

做这本书的过程中，我脑中深藏多年的问题逐渐变得清晰：为什么当年北京最好女校的学生会在文革初期变得如此凶残？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该如何评价“十七年”的教育？等等。做口述史时一步步梳理我们的成长过程，是在帮助我自己回答这些问题。

口述史对话同伴马笑冬的母亲是北京一所女中的党支部书记，文革中挨斗挨打，被学生剃了阴阳头。在少年马笑冬的印象里，事发之后父母的表现没有异样。母亲在文革结束后不久即患癌症去世，弥留时说胡话讲的都是那天挨斗的事。为做口述史，笑冬去向父亲了解情况，始

知父母当时的情感经历。在子女面前他们强装无事，但从不落泪的父亲深夜为妻子擦拭伤痕时，“泪如泉涌”。三十多年后马笑冬了解细节真相后，泣不成声。

我的文革记忆带着抹不掉的八五血迹。在口述中我讲述了八五事件的大致经过，但我是个做历史的，很想就八五事件作一认真的历史调查，2001年秋到您家找照片时恰恰也是我开始做调查之时。

不知您是否记得，我去时带了一本同学冯敬兰写的书，她书中有一篇题为“记忆的疮疤”的文章，讲的是八五事件。我送您那本书，是想告诉您，我们都没有忘记卞校长的惨死。您当时让我写几个字。因为不是我的书，我有些为难，后来在扉页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作为女附中的学生，我感到有罪”。

我做八五事件的调查是带着双重身份的：我既是个历史工作者，也是当年女附中的学生，而后一个身份无法让我站在“外面”或“高处”来评点事件、臧否人物，而是要把自己放进去，背负着女附中有史以来最沉重的集体耻辱。怀抱愧疚忏悔之心。就是因为感到“有罪”，我多年来无法面对您，一直没有来看望您，虽然我父母与您和卞校长“进城前”同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工作过，要找到您是有办法的。

那天见面后，您即给我看了一张照片，是70年代卞校长骨灰重新安放时（？）的合影。照片里有我的母亲。您告诉我，新华社的老同事中只有我母亲参加了骨灰安放仪式。我也是第一次才知此事。印象中我妈妈五、六十年代和卞校长的来往并不多，但她是一个极富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我想，我父母的为人让您对我很快产生了信任。

那段时间的见面有几件事令我难忘，不知您还记得吗？

应该就是在第一次见面时，您给我看了您自1966年冬天即开始做的对八五事件的访谈笔录。第一次访谈是11月间对校工王永海的，第二次是12月初对胡校长的，还有对其他人的。。。都是您的笔迹，写在一些纸片上。因年代久远，纸片已经有些发黄，字迹也不甚清楚了。我完全没有想到您在当年那么艰难危险的情况下，居然已经开始收集历史证据！坐在您房间的椅子上，我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珍贵的纸片，没有注意您何时悄然离去。当我抬起眼睛，看到您在我面前不远处放了一件东西。我拿起一看，是一张照片。

乍一看，我不能辨认照片上是什么。后来经您说明，我才知道那是卞校长的手，肿得像戴着拳击手套一样。后来我又看过多张卞校长遇难后的照片，那第一张对我的震撼最大！

您告诉我，您当时特地买了相机，拍摄下这些惨不忍睹的场面。您还说，火化卞校长那天，你们一家人须经过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的北京街道。你们极为哀痛的心情和周围亢奋的“革命”氛围形成极大反差。

王叔叔，您是经历过大痛大苦的人。在8月5号前后几天，您不但失去了妻子，还失去了两位多年的老友，三人都死于非命。那几天您承受了一个人所能承受打击的极限。

同时，您还是父亲，最小的孩子四宝才八、九岁。您要独自撑起有三个未成年子女的破碎之家。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下，没有人敢公开对你们表示一丝同情。

您的内心深处一定是极为孤独的。经受过大灾大难的人内心都是极为孤独的。

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您还是保留下了历史的人证物证。这需要多么巨大的道德勇气，坚韧的意志力，和历史的识见与担当。这些品德是我对您最为敬佩之处。

多年后，看到您在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中一件件出示卞校长的血衣、遗物时，我在心里想，您为所有的文革受难者做了功德无量的大好事，历史会记住您不朽的功绩。

最初的几次见面中，还有一次对话也令我难忘。您多次提及一位袁某人，对她当年对卞校长的造谣诬陷不能释怀，还给我看过一张她拙劣伪造的照片。她是外单位的人，卞校长养病期间与她结识。文革初期，她对在不明真相的年轻学生中败坏卞校长的清誉起了极为恶劣的作用，但没有证据证明八五那天批斗校领导与她有直接关系。因为几次见面都说的是袁某，有一天我问您，您为什么不提那天上手打人的学生们？

您回答说，“她们都是孩子”。

我记住了这句话。文革中我父亲的专案组长曾厉声训斥过我和我弟弟，我因此多年不能原谅此人。您的这句话触动了我。您是有博大胸怀的，也十分明了当时的时势。

此后我介绍于羚与您认识，帮您整理那些宝贵的文字资料。于羚是我插队时的好友，当时已退休，本不想再做什么事。当我告诉她您需要帮助时，她说，我责无旁贷。为此她专门学会了电脑打字。一次我在电话里问您对于羚的工作还满意吗？您说，（于羚）是踏破铁鞋无处觅啊！一连说了好几遍。

2006年清明节期间，我和于羚在事先征求了您的意见后带刘进到您家看望。刘进来时，带了一束鲜花。您欢迎刘进的到来。那天我们照了几张相，您把其中您和刘进两人单独照的一张交炎黄春秋发表。刘进是文革初期学生代表会的主要负责人。我和于羚议论，您很看重刘进在清明期间的到访，因为这其中明显有悼念卞校长的意味，您是接受了刘进的悼念的。

那一次宋彬彬也十分想来，但因她“符号”色彩太重，怕刺激您，就决定先不与刘进一同来，以后再来拜访。

2006年的8月5号是卞校长去世四十周年。那天有一个纪念活动，您和家人及一二十位客人出席，女附中学生只有我和于羚两人参加。您可能不记得了，我那天是迟到的。我父亲2005年突然大面积脑梗塞，开会当天上午我们子女在医院签字同意安放心脏起搏器后，我匆匆赶到纪念卞校长的会场。

那天的会上放了胡杰的电影“我虽死去”。我是第二次看这部影片了。当卞校长最喜爱的歌曲“太行山上”响起时，我又流泪了。我几乎在襁褓时即熟习这首歌的旋律，卞校长和我父母都是抗战时参加中共的“三八式”干部。我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哀痛，为父母辈哭泣。

影片中有我校一些学生在您家门口贴的辱骂卞校长大字报的镜头，语言粗鄙不堪入耳。我为我的同学感到深深的羞耻。看完电影后，我站起来代表女附中学生向卞校长和您道歉，于羚也讲了话。在卞校长四十周年的忌日，作为唯一到会的两个女附中学生，我们必须代表全校学生道歉。

从那一天以后，如果没记错的话，我们就再没见过面了。

客观原因是我父亲的病况。我每年假期回国，来去匆匆，主要任务是帮助看护数度病危的



衰老的老父。

但也有我至今说不清也不理解的原因。我们曾听到一个十分下作的谣言，不知源头在何处，我和于羚都很诧异，这可能造成我们之间的误会。也还有一些其它因素。

有几次，我和于羚商量着去看看您。但想到您年事太高，身体欠佳，怕去了是打扰，终未成行。

在我做关于八五事件的调查研究时，王友琴同学已经发表了几篇关于八五的文章。在一处她写到（大意），她一次返回女附中校园（现实验中学），在卞校长倒下的宿舍楼前问几个年轻学生，是否知道1966年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没人能回答。当年血的历史能够被如此彻底地遗忘，令友琴同学感到不可原谅。

在这个问题上我与王友琴是相通的。2001年秋我去实验中学校史办找卞校长照片，工作人员居然不知道卞校长当年是被本校学生打死的；2002年春为纪念学校成立85周年而印制的校史“大事记”中，在1966到1976年期间，除了提到学校改校外，其余一片空白。

王叔叔，我尊重王友琴同学多年来为“文革受难者”、特别是其中的“小人物”所作的呕心沥血的工作。这个态度，我曾在几处表达过。

同时，对于八五事件和广义的文革调查研究，我的基本想法是，做的人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大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做。如果有不同看法，应该平和地交换意见，这样有助于越来越接近事实真相，有助于对文革研究的推进。

我始终认为，历史是公器。05/06年我在北京期间，听说徐晓等人在帮王叔叔出一本关于八五事件的书。当时我已经做了一些调查，文章也有了初稿。一天，我与徐晓等人见面，原原本本地将我当时掌握的材料和我的观点与她们分享。那天在场的还有我一贯尊重的文革研究者印红标。一起吃晚饭时印说了一句我十分赞同的话，做历史研究，应本着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的态度。

这些年来，对女附中八五事件有一些争论，形成了两个有些不同的“版本”。在我写过的关于八五的几篇文章中，我自己最看重的是“卞仲耘之死”一文，就是前面说的我2001年秋想做的历史论文。这篇文章根据我对20余位原女附中师生的访谈调查，附有一百多条注释，于2006年秋在美国一家英文学术刊物上发表。07年夏，一位老三届朋友义务将其翻成中文（不包括注释）。07年九月初实验中学庆祝90年校庆的周末，我校对了译文，将它用“白芳”的笔名发表在“二闲堂”网站上，并写了下面一段话：“在母校喜庆的日子，拿出一篇祭奠卞仲耘校长的文章，有些‘煞风景’。但是，我们不但应该庆祝校庆，也不应该忘记校耻。”

前两年，我对这篇文章的中译文作了修正润色，并将注释全部译出。该文已收集在台湾秀威书局2013年出版的“故事不是历史”书中。

王叔叔，您是历史学者，是我的学术前辈。在八五事件的研究上，我最主要强调了两点：一是把它放在文革初期的历史场景和语境中去，尤其重视最上层始作俑者的作用；二是关注暴力在文革发动期的重要功能。卞校长恰恰惨死在纵容暴力发动文革的时间节点上。

8月5号的女附中校园，由于工作组的突然撤离、血统论对联的“横空出世”、和上面直接

鼓励学生“自己解放自己”“踢开工作组自己闹革命”，出现了最高领导所希望的“乱”，出现了暴力产生的条件。乱和暴力如影随形。王叔叔，您经历过多次革命运动，对这点一定有体会。当时对学生们影响最深的语录，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力，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

在当时的语境下，当天发起游斗校领导的高一某班学生的行为，是响应号召的革命行动。

工作组撤离后合法性成为问题的以刘进为首的原师生代表会，以她们自己对政策的理解前去劝阻游斗打人行为。但在当时的语境下，她们的劝阻是软弱无力的。我把她们叫做“软弱的政策派”。

王叔叔，在文革发动期，“讲政策”是不符合上面精神的。在当时的形势下，有几个人敢出来讲政策？8月10号新华社“造反派”自发游斗“走资派”和有“各种问题”的一百多人，规模比女附中大得多。在游斗的过程中，“造反派”“全般武艺”都上了，一位副社长（我想您一定认识）被打得半死。我从远处听到野蛮的喧嚣喊叫声，不敢相信那是从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大机关发出来的。当晚即有四人自杀，可见游斗现场的惨烈。当场有谁敢出面阻拦？有谁敢出来讲政策？这还是堂堂的中央机关，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方针的国家通讯社！

至于宋彬彬，她当时是刘进的副手之一，并不是所谓的“红卫兵负责人”。她八五当天没有任何突出或有别于工作组期间成立的师生代表会团队的行为。对于代表会主要成员在批斗校领导过程中和卞校长倒下后，可以和应该做些什么，我在充分考虑当时形势的情况下，在一篇文章中做过讨论。

宋彬彬所以在今天仍然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因为“八一八”，而不是“八五”。

我始终认为，关于女附中八五事件本身，将注意力集中到宋彬彬身上，是一个“伪命题”。

我对“宋彬彬 / 宋要武”问题的兴趣，是去看一个历史的“迷思”（myth）或“传说”是怎样产生，发展，变形，壮大，而葆有持久不衰生命力的。这让我对中外历史上其他“迷思”或传说产生兴趣。我的兴趣是关于人类社会政治文化心理的。我希望有一天会有学者研究一下文革中的传说，“宋要武”传说大概是其中最有意思的一个。

王叔叔，我的看法您可能不同意。但在父母的老同事、我所敬重的长辈面前，维丽只能说实话。请叔叔理解、见谅。

您见过刘进，也许没见过宋彬彬。我06年春认识宋彬彬，对她进行访谈。我和宋的关系，始终是历史研究者和被研究者的关系，有意识地保持一定距离。我对她的了解是这些年逐步深入的。一开始，就像许多国人一样，我对她是有疑的。我清楚地记得，我访谈开始时对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因为不相信她没叫过“宋要武”，当面质疑她。

我后来反复核查的结果证实，她确实没有改名叫过“宋要武”。在一篇文章中（“从八五事件讲起”），我有些调侃地说，“宋要武”是“全国人民”给她改的名。

但她背了四十多年“宋要武”的黑锅，千夫所指，至今在一些人眼中“十恶不赦”，“永远钉在了历史耻辱柱上”。

一个因机缘（多数为偶然）被造就的“符号”，一个当年不满19岁的青年，应当对文革的

累累血债承担什么责任？这是我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背后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我愿请教历史学者、法律专家和所有关心文革历史的人们。

王叔叔，我这些年目睹宋彬彬从初始的满腹委屈和急于辩解，到逐渐地跳出“小我”，比较真切地感受到广大的、形形色色的“普通百姓”在文革中的深重苦难，一步步地向“外”走，向前走。在这方面，我同班出身社会底层的同学冯敬兰提供的文革受难“小人物”的视角，对宋彬彬帮助很大。她走到了今天，走到了一月12号在女附中师生见面会上的含泪发言。在这个过程中，她承受了巨大的、长久的、不为外人道的、来自多方面的压力。

我要说，宋彬彬赢得了我的敬意。

王叔叔，下面给您汇报一下最近召开的两次会议。

您也许听说过，近年来我们形成了一个“五人团队”，其实今天我们的团队已经远不止五人，其中有您见过面的罗治，和北大法学院教授李红云等人。大家的背景经历不相同，看法观点也不尽一致，如果写文章，也都是文责自负。但有一个共同点将我们连在了一起，那就是对历史的基本责任感。

去年11月下旬，因受到早些时候八中陈小鲁等人集体向老师道歉的启发，我“冒”出个想法，希望在寒假期间召开一个有若干北京老三届同代人参加的座谈会，从女附中八五事件谈起，但要超越女附中，共同反思文革。我在给朋友们的电子邮件中说，从我个人来讲，文革事过越久，世人的文革记忆越淡漠，越扭曲，越荒唐，就越有一种沉重的责任感，甚至是一种很个人的“耻感”。犹太人没完没了地讲述他们的故事，几十年了，没嫌过烦，教育一代又一代人。中国的文革到今天已经48年了，当年的少年，今天已步入老年，我们再不讲，文革就会被遗忘得干干净净。陈小鲁等人的道歉，引发社会效应，让文革历史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我们应该跟进。

这个简单的想法，得到大家积极热烈的响应，纷纷出谋划策，陈小鲁也在第一时间表示支持。这就是今年一月4号第一次会议的“缘起”。这次题为“八五 记忆 反思”的会议被定位为同代人的座谈会，除了女附中和八中的一些同学，还有几位既是老三届又是文革研究者的朋友，也请了少数媒体。会议的宗旨是“直面历史，抢救记忆，反思文革，拒绝遗忘”。这次会议已经整理出一个发言纪要。

一月四号的会议是成功的，会上媒体的青年朋友也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为什么不邀请老师参加。一月8号，我们开了个总结会。会后有几个同学一起去看望原初三四班班主任金老师。在金老师家，我们提起年轻人的问题，也表达了希望召开一个类似八中向老师道歉的会议。快人快语的金老师说，要开，就赶紧干，要不就来不及了。随后，文革后出任过实验中学校长的王老师也来到金老师家，“现场办公”，与现任校领导联系，拍板将“老三届学生与老师见面会”（一个刻意不“敏感”的名称）定在一月12号召开。所以这样急，一是为了赶在春节之前，二是为了在周末，三是为了就公事繁忙的王老师的时间。金老师说，时间紧，天气冷，老师们高龄体弱，有的住的很远，能来七八个人就不错了。我也觉得满打满算只有三天准备时间，太紧张了。但当时的感觉，是老师们在推着我们走，师生一拍即合，完全想到了一块儿，大家都很高兴，都想完成一件在每人心目中已拖欠太久的大事。用刘进的话讲，是水到渠成，瓜熟蒂落。

王叔叔，我在给您信的开头说，12号的会议让我感到一种多年久违的精神升华。这次会议的宗旨，在一月四号会议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宽容和解”四个字，这是罗治在金老师家提出来的，我觉得非常好。虽然会上有刘宋等学生的发言，也来了不少同学，包括负责做塑像的

原六五届同学，但会议的真正主角是老师们。我们都没有想到，虽然只有短短三天的通知时间，但一下子来了二十位老师，有的年近九十，有的临时停了点滴。看着在寒风中被搀着扶着蹒跚而来老人们，我想落泪。我突然明白，老师们等这一天等的太久了！

老师们都白发苍苍，学生们也都鬓角灰白，大家共聚在安放卞校长塑像的会议室，心中都有一种难以言表的特殊感觉：48年后，我们在共同见证历史。

王叔叔，此时此刻，我多么希望您在场！

一位摄像记者事后告诉我，他注意到，在会议过程中，八五过后用左手给您写匿名慰问信的张老师一直在默默流泪，旁边一位老师的一滴眼泪长久挂在眼角边，她忘了去擦。一位男老师发言说，他得知卞校长的塑像被安放在这间会议室后，远道径直而来，推门而入，向卞校长的像敬了一个军礼，说，“卞大姐，我来看您了”。那位年轻记者说，他听到这里，“再也扛不住了”，一边拍摄，一边落泪。

老师们的发言句句出自肺腑，王老师讲的尤其深刻精辟。胡校长的女儿丁冬红（胡依年）说，她母亲生前多次跟孩子们讲，那天发生的一切她都历历在目，学生的名字都能叫得上来，但是她“原谅所有的孩子们”。

在现场气氛的感召下，有两个当年斗争过老师的学生当场道歉。

给我印象深的，还有教数学的张老师一席非常朴素的话。他说他四十几岁的孩子不知道文革，二十几岁的孙子更不知道。我们应当让后人知道文革。

王叔叔，我觉得，如果我们的共同努力（包括王友琴同学多年来的不懈努力）能够让一些人想去知道文革是怎么回事，以民间促政府，一点点地去“拱卒”，我们也算尽了一点历史责任。您历尽艰辛保留下来的历史证据，会被后人永远珍存，您可以告慰卞校长和所有的文革受难者了。

祝您和家人好！祝马年新春快乐！

您的晚辈

维丽

□ 《共识网》2014-01-25  
~~~~~

【拷问良知】

再谈良知与责任——评宋彬彬道歉

• 裕 雄 •

经历了几近半个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国百姓终于等来了对文革受害者的个人道歉。

在红二代中，继陈毅元帅之子陈小鲁诚恳道歉，认真反思之后；2014新年伊始，北师大女附中的宋彬彬和刘进等人也向当年被她们批斗的学校领导与老师道歉，成为海内外的爆炸

性新闻。

北师大女附中卞仲耘副校长被学生殴打致死，紧接着校文革学生领袖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这是文革的两大标志性事件。如文革研究学者王友琴所说，“1966年8月5日，卞仲耘被杀害的时候，……，文革以‘革命群众’之手、以‘革命’的名义来杀人的时代开始了。”而毛泽东8月18日接见红卫兵，并对宋彬彬说‘要武嘛’，更是一声全国范围的暴力与杀人的号令。这就是宋彬彬道歉引起巨大反响的原因。

非常遗憾，读了宋彬彬的八百字道歉信后发现，洗刷与辩白多于愧疚与忏悔。

笔者本人也是师大女附中的学生，高宋彬彬一届，与她认识但不熟悉。七年之前曾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文章：“良知与责任——纪念卞仲耘校长遇难四十周年”，署名‘裕雄’。（见本刊zk0612c——编者）后又与同班同学华欣一道，倡议为卞校长塑立铜像。尽管我们多数人手上没有血，但身为‘喝狼奶长大的孩子’，谁心中没有愧疚？！我在文章中写到，“让我们这代人肩负起责任，告诉后代我们走过的路：我们的迷茫，错误甚至罪过，以及我们的觉醒。让我们为社会的进步尽一份力，以补偿卞仲耘校长和其他千千万万殉难者的牺牲于万一。”由于身在海外，我们两人未能参与具体工作，塑像从捐款、制作到安放仪式，都是由高宁、刘蓓蓓（已故）和罗治等人主持的。整个过程的基调，尤其安放仪式所呈现的，始终是‘忏悔’二字。

宋彬彬反而不同。几十年来，‘委屈’是她的主调。通过这次道歉她所传达的，第一，她没有参与暴力活动；第二，她没有改名‘要武’；第三，她一生恪守‘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作人’的原则。

作为对真相有所了解的校友，第一、第二条笔者不但相信，而且理解她有委屈。但第三条，一面道歉，一面信誓旦旦地美化自己；却令人不能不怀疑她的诚意。及至在互联网上看到她与张玉凤等人共祝毛诞的消息与照片，方知她一直是忠实的毛左，遂疑团顿释。

宋彬彬不只一个人。几位女附中校友长期以来为她辩护，并多次攻击第一个写出真相、同为校友的王友琴博士。王友琴对于文革研究的奠基性贡献，已经载入历史。关于卞校长之死，她指出的是宋彬彬的责任，从未指控宋本人参与了暴力打人。她的文章在某些细节上或许有出入，需要修正和改进；但在基本事实和结论上，则不但正确，而且尖锐、深刻。宋彬彬和她的辩护者，却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纠缠于枝节来掩盖整体。

以下道理希望宋彬彬和其辩护者们能够明白：

第一，宋彬彬乃文革初期的学生领袖。叫‘学生会副主席’也好，‘红卫兵负责人’也罢，没有本质区别。众所周知，所谓‘红卫兵’，是文革（主要是前期）参与造反的青年学生的统称，并没有一个严密的组织。宋彬彬给毛泽东带的，不正是红卫兵袖章？对其身份名称纠缠不休，除了辩论中抓对方的辫子外，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工作组时期学生中的掌权人物，工作组撤走之后可能风光不如往昔，但仍然是学校唯一的掌权者。卞仲耘遇难前后全校范围内对校领导的批斗、卞校长死亡的宣布与处理都是她们决定并执行的。追究其在该事件中的责任理所应当。

在此抄录卞校长丈夫王晶垚保存多年的一份知情人谈话记录：

刘进在广播中这样讲：“昨天发生了武斗，是为了杀卞仲耘的威风。因为她有心脏病，高血

压，死了。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大家不要因为发生这种事，就缩手缩脚，不敢干了。这件事，任何人都不许向外面讲，否则就按破坏文化大革命处理。”

这段话所透露的信息，与刘、宋道歉中‘阻止不力’、‘没有保护好……’的轻描淡写形成巨大反差；她们在学校中的权势亦一目了然，证明‘权力真空’实属谎言。

第三，抛开卞校长遇难事件不论，宋彬彬等作为文革打手整人、迫害人的历史事实无法否认。对一个在文革中呼风唤雨、荣极一时的学生领袖，在全国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不堪的一笔；要求她作出诚恳的道歉与深刻的忏悔，不更是天经地义么？

文革结束后，宋彬彬等人侥幸地未曾受到惩处。蒯大富等大学文革领袖们付出的，可是多年铁窗的代价。过来人都明白，文革中的大学领袖皆为平民出身；而中学领袖和打人杀人者，多为红二代。并非后者罪行轻于前者，其刑事责任其实更易于认定；然而后者不但逃脱了惩罚，而且很多人后来平步青云，身居高位。这正是中共不肯清算文革的隐情之一。

第四，据报道，卞校长家人拒绝接受宋刘等人的道歉。这是为什么？怎样做才能得到受害人的宽恕？宋彬彬又如何洗刷‘冤屈’，撇清‘杀死七、八个人’之类的谣言？

第一位的当然是事实真相。没有真相，谈不到宽恕。其实局内人早已知晓：哪几个学生致卞校长于死地，夺命的最后一击出自谁手？然而，真相被刻意隐瞒，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四十八年了！为了替妻子讨还公道，王晶垚老人奔走呼号，泣血力争；你让他如何接受一个不明不白的结果？正义又怎能伸张？！

真相大白于天下之日，就是宋彬彬‘打人杀人’罪名洗刷之时。我们希望知情者揭发，更盼当事人良心发现，主动坦白。惩罚也许会有；然而接受了惩罚，也就卸掉了包袱，得以在人生路上再出发。

宋彬彬道歉了。尽管诚意有限，毕竟为清算文革打开了局面。更多的人会勇敢地站出来。同时更重要的，如不少人所指出，中国百姓期待着对文革的彻底清算，和国家的正式道歉。

文化大革命由毛泽东发动领导，目的在于以青年学生开路，利用民众力量来打倒政敌——刘少奇和邓小平等人；为此不惜将整个国家搅个天翻地覆，不惜夺去千百万人的宝贵生命。至于刘邓，既是受害者，亦是害人者。刘邓领导下的工作组，对各级领导和群众按左、中、右排队，整肃，是共产党的传统做法，是第二次反右。岂知‘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毛泽东正等着抓其把柄，一举打倒呢。

卞校长遇难，正处于刘邓与毛此消彼长的过渡，使事件更显复杂，扑朔迷离。事实是，卞校长先被刘邓路线整肃，后死于毛泽东教唆与支持的暴力狂潮。与此同时，由于其特殊的出身背景和主动积极的表现，宋彬彬为刘邓工作组倚重在先，变成毛泽东的暴力符号在后。她之被钉上‘历史耻辱柱’，和王友琴毫无关联。

文革对人的迫害规模空前，残酷至极。一批又一批的人被整肃，被打倒，被迫害致死。整个国家几乎无人不受波及，不是受害者就是加害者。即使旁观，也免不了违心地呼几句口号，令受害人痛彻心肺。卞校长是无数文革受难者的一个代表。她为共产党的事业奉献一生，却被其政治风浪无情吞没；为青年一代兢兢业业，呕心沥血，最后竟惨死在学生手中。

“我们需要做的是对整个文革的思维和基因进行认识”，宋彬彬此话说得很好，我们希望她

身体力行。

在‘良知与责任’一文中，我这样写道：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九四九年以后连续不断的政治运动，使斗争哲学泛滥，道德标准颠倒，人类的同情心泯灭；加上宗教般狂热的造神运动，和血统论的推波助澜；文革只是这一切合乎逻辑的总爆发。文革是思想奴役的结果，是人性扭曲的必然。成年人尚且把握不住自我，何况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学生？可偏偏文革之初，国家的最高权力者将尚方宝剑交给一群不知人间疾苦，优越自负的贵族子弟；导致了一幕幕的人间惨剧。”

“经历了文革的大起大落之后，我们忽然发现，神是不存在的。其实真神在我们心中，那就是人类的良知。只要不说违背良心的话，不做违背良心的事，人生之路就不致大错。”

愿以此与女附中校友共勉。

□ 原载《万维读者网》

~~~~~

### 【直面历史】

#### 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

• 王晶垚 •

1966年8月5日下午，师大女附中（现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红卫兵以“煞煞威风”为名在校园里揪斗卞仲耘同志。红卫兵惨无人道地用带铁钉的棍棒和军用铜头皮带殴打卞仲耘同志，残暴程度令人发指！

下午3点钟左右，卞仲耘同志倒在校园中。她遍体鳞伤、大小便失禁，瞳孔扩散，处在濒临死亡的状态。红卫兵将卞仲耘同志置放在一辆三轮车上，身上堆满肮脏的大字报纸和一件油布雨衣（这件雨衣至今我还保留着）。在长达5个小时的时间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拒绝对卞仲耘同志实施抢救（邮电医院与校园仅有一街之隔）。直至晚上8点多钟卞仲耘同志才被送往邮电医院，人已无生还可能。

卞仲耘同志死亡第二天，红卫兵负责人刘进在对全校的广播中叫喊：“好人打坏人活该！死了就死了！”真是丧尽天良。

1966年8月18日，卞仲耘同志遇难十三天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北京红卫兵代表。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宋彬彬登上天安门，代表师大女附中的红卫兵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这个袖章上沾满了卞仲耘同志的鲜血。毛泽东对宋彬彬说：“要武嘛。”

1966年8月18日之后，北京市又有1772人被红卫兵活活打死，其中包括很多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卞仲耘同志遇难已经48年。但是，“八五事件”的策划者和杀人凶手至今逍遥法外；“八五事件”真相被蓄意掩盖着。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刘进二人竟以“没有有效阻止”、“没有保护好”、“欠缺基

本的宪法常识和法律意识”开脱了她们在“八五事件”中应负的责任。并仅以此为前提，对卞仲耘同志和其他在“八五事件”中遭受毒打的校领导及其家属进行了虚伪的道歉。

为此，作为卞仲耘同志的老战友、丈夫，我郑重声明如下：

- 一、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是残杀卞仲耘同志的凶手！
- 二、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没有抢救过卞仲耘同志！
- 三、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特此声明！

王晶珏

2014年1月27日

□ 原载《纵览中国》

~~~~~

### 【千秋功罪】

宋彬彬身后的人们

• 袁 凌 •

1966年8月18日的那天，宋彬彬登上天安门城楼给伟大领袖戴上袖章，以及被领袖谕示“要武嘛”的时候，或许没有料到，她此后将再也不能从“宋要武”的十字架上下来。直到日前她第一次走出沉默，向公众道歉，仍旧引发了“洗刷罪名”的争议。

宋彬彬对媒体说，几十年来在她身上一直有两个人，一个是宋彬彬，一个是宋要武。前者是真实的她，后者是她背负的“红卫兵暴力”符号。让宋彬彬变成宋要武的，除了她本人那次给领袖戴袖章的举动，以及此前在卞仲耘之死中的某种缺少担当，还有很多来自他人的因素。在变成了红卫兵符号的宋彬彬身后，站着一系列他人的身影。

他们各自在有意无意中，将一个普通的“老红卫兵”宋彬彬一步步推到了“宋要武”的位置上。不提及这些名字，就无从还原文革背景下宋彬彬的罪与罚。

#### 1、彭小蒙

在文革期间，彭小蒙是和“宋要武”同样著名的中学红卫兵，但她的出名并非由于戴袖章的机缘巧合，而是靠打先锋拼杀出来的。

彭小蒙是北大附中的学生。当年的老师回忆，1966年7月26日，她在中央文革冒雨接见学校1万名师生的时候，率先抡起铜头皮带抽打工作组组长张承先，雨水和血水混流，震惊了在场的所有师生，包括到场的中央领导人，却得到江青的赞赏和热烈拥抱，从此开创了红卫兵暴力殴打（武斗）的风气。5天之后，毛泽东在给清华红卫兵组织的信中表扬了彭小蒙在殴打张承先的会上的讲演，以及她领导的“红旗战斗小组”。江青更称彭小蒙和她的“战友”们是“小太阳”。

此后彭小蒙在打人斗人中一直亲自上手，表现抢眼。王友琴的《文革受难者》记载，北大附中初中一年级女学生万红，因为父亲是右派遭到男红卫兵殴打，奔进女厕所试图躲避。当时



彭小蒙也在女厕所里。万红求彭小蒙，说“毛主席接见过你。你知道政策。请让他们别打我。”但彭小蒙把她从女厕所里拉了出来。万红被命令站在一个凳子上挨斗，被铜头皮带抽打，又有同学把凳子从她脚下抽走，使她重重摔在水泥地上，面青鼻肿。

王友琴还记载，彭小蒙曾经到北京外国语学校、女十二中、灯市口中学等学校进行“串联”鼓动。

8月18号的那次天安门城楼接见中，彭小蒙风光无限。她是唯一代表北京红卫兵发言的人，面向全国直播。相比之下，宋彬彬的给毛戴袖章有一定偶然性。但更重要的是，宋彬彬得以登上天安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彭小蒙。

孔丹回忆录《难得本色任天然》引述彭小蒙的回忆称，当时红卫兵上天安门由中宣部副部长雍文涛安排，雍文涛让彭小蒙推荐人选，彭小蒙推荐了师大女附中、四中、北大和清华附中等学校，每校20人。根据这份回忆，当时楼下的几十万红卫兵，谁上天安门的决定权在彭小蒙手里。如果彭小蒙没有推荐女附中，宋彬彬就得不到上城楼的机会，遑论给毛戴红卫兵袖章。当时同样在城楼下的八中陈小鲁等人，就没有机会上楼。

从彭小蒙的挑选来看，以她认为运动搞得比较好的学校为主，但并无一定标准，譬如四中的红卫兵负责人秦晓、孔丹都属于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师大女附中激烈反工作组的“主义兵”，也没有得到上城楼的机会。这也说明，老红卫兵内部还谈不上明确的“保工作组”和“反工作组”分野。

宋彬彬给毛戴袖章之后，她和彭小蒙就成了当天最出风头的两个红卫兵。但“宋要武”的概念性意义逐渐压过了彭小蒙。

据王友琴记载，文革以后，彭小蒙在报纸上发表文章，诉说她自己和父母在文革中受了迫害，但没有提到自己当年的风光一时。

彭小蒙的父亲是全国红十字会领导，属于高干子弟。但显然没有宋彬彬父亲宋任穷的“上将”和政治局委员地位来得显赫。这也是她不适合充当红卫兵符号的原因。尽管是她促成了宋彬彬走向城楼的一步。

## 2、刘进

刘进是推动宋彬彬登上天安门的第二个关键人物。

刘进是宋彬彬的高三（3）同班同学。1966年6月2日，她听到广播中聂元梓的大字报，带头写了女附中第一张要求文革的大字报，并找到宋彬彬等签名。工作组进校后，刘进成为工作组任命的师生代表会的主席，宋彬彬等四人是副主席。

工作组撤走之后，紧跟着发生了卞仲耘之死的事件。在这次事件中，刘进和宋彬彬一样，没有能够有力制止低年级学生的殴打行为。事后她们将卞仲耘送到医院，和在场的李松文老师一起，在字条上留了名字。这张字条上，刘进排在倒数第二个，宋彬彬排在最后一个。当天晚上，刘进和宋彬彬一起向北京市委书记吴德汇报了情况，吴德表示“死了就死了”。第二天刘进在学校广播中讲述了汇报经过和吴德的话。刘进说：“一些同学就记住了一句‘死了就死了’。”

此后，刘进和宋彬彬等人一起成立了师大女附中“文化大革命筹备委员会”，担任主任，宋

彬彬等担任副主任。这个组织联络了接近工作组和反对工作组的两派学生，继续引导学校中的“文革”。以后由于宋给领袖献袖章引起校内纷争，刘进和宋彬彬一同退出了筹委会。纵观始终，刘进和宋彬彬始终一同进退，而刘进始终处于主导。

“8·18”毛泽东接见红卫兵当天，刘进是领队。接到红卫兵登上天安门城楼的指令时，随父亲从河南赴京、一向低调的刘进对宋彬彬说：“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从各班挑40人带队去。”宋彬彬因此带队登上天安门，刘进却留在城楼下。

事后看来，刘进的这一个决定，造成了两人在文革中角色的重大分野。宋彬彬由此走向宋要武，刘进却仍然是刘进，一个普通的高干子弟、老红卫兵。

宋彬彬登上了城楼，但她能给毛泽东戴袖章，自然也有她父亲的身份起作用。宋彬彬本人回忆，身后一个空军大院的男生鼓励她给毛主席戴袖章，而一旁站着的公安部长谢富治曾和宋任穷一块工作过（查阅履历，二人同授上将，解放战争时期谢富治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兵团政委，而宋任穷任第二纵队政委），认识宋彬彬，因而允许了宋彬彬去献袖章。

据宋彬彬本人称，毛泽东并未问起她的父亲，也不认识她，只是问了她的名字。“要武嘛”三个字也是随口说的。但这三个字的分量却不同一般，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的匣子，掀起了红八月的“武斗”暴力潮，文弱的宋彬彬也从此变成了“宋要武”。

宋彬彬的高干子弟身份使她有机会去向领袖献袖章，但她保工作组的立场，却使她献袖章的行为在校内引起了争议，反对工作组的“主义兵”表示她没有资格献袖章，认为这样做不利于运动方向发展。事后看来，“主义兵”可以说准确预测了领袖的心思。在戴上“红二代”宋彬彬献的袖章时，毛已在考虑对她的父辈“走资派”们开火，这或许是他不问宋彬彬父亲姓名，却亲自为她“改名”的真实原因。

当天上城楼的学生共400余人。如果刘进不是决定让宋彬彬上城楼而自己留下，这一情节或许不会发生。

2007年，改名实验中学的师大女附中评选杰出校友。起初参与评选的决定由宋彬彬自行做出。但以后对于宋彬彬出现争议，学校征求刘进的意见，刘进主张若拿下宋彬彬会对宋的负面影响更大，且宋彬彬不属于文革后受到清查的“三种人”（编者注：指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作为麻省理工学院地球行星科学系第一位大陆女博士，具备知名校友资格，因此建议保留。

校友们的意见影响了宋彬彬，几天后她决定继续参选。不料，参选的后果超出了她的预料，宋彬彬再次卷入漩涡中心。

近年来，刘进一直在和校友们推动还原8·5事件历史。2013年1月4日，在北京大学原禹贡学社召开的“8·5事件真相”研讨会上，刘进说自己一直想还原她和宋彬彬在卞仲耘和天安门献袖章事件中的真实角色，分担宋彬彬肩上的责任。无奈，这不取决于她。

### 3、男记者

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袖章之后，下午返校，接受了一位《光明日报》年轻男记者采访。他听说了领袖对宋彬彬说的两句话，还让宋写下了这两句话。

两天之后，《光明日报》发表了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署名宋要武，括弧宋彬彬。这篇文章以宋彬彬自述的口吻，将她改名宋要武。《人民日报》紧跟着转载，“宋要武”的大名播于天下。

宋彬彬说，这完全出乎她意料。她从来没有要改名为“要武”。但外界已经认同这一“御名”，宋彬彬开始收到成麻袋的信件，署名“宋要武”收。由于宋彬彬和宋要武两个名字都不便再用，宋彬彬改名宋岩，一直使用到文革之后。

宋彬彬究竟有无改名宋要武，连她的朋友们都不太清楚。陈小鲁是宋彬彬丈夫的同学，他一直到了本世纪初听宋彬彬本人辩白，才知道她并未改名。

宋彬彬变身“宋要武”后，并未参与抄家破四旧。但她的武汉之行，却进一步加强了“宋要武”的影响力。据宋回忆，当时王任重动员她和刘进去武汉保湖北省委。这或许含有借重“宋要武”影响力的意味。刘进没去，宋彬彬却和四位同学一起去了，她自称原因是王任重是宋任穷老部下。

在武汉，宋彬彬发表了保湖北省委的文章，据她说署名本来是宋彬彬，被省委的人改名宋要武发表，而且加上了很多谩骂词汇。当时宋很意外。这篇文章影响极大，连宋彬彬的学校都被谣传改名“要武学校”。以后，“派鬼女儿”保湖北省委之行也成为江青打倒宋任穷的一条罪状。

始作俑者的那位《光明日报》记者，并未在稿件上署名。据宋彬彬讲，文革后她曾找到《光明日报》社长穆欣，查找那位记者，却并没有找到。

如果宋彬彬之言属实，那位“年轻的男记者”，为了切合当时的政治主题，创造性地把领袖的一句话改成了“宋要武”这个具有魔力的名字。时过境迁之后，自然难以出头承担这份责任，以免染上“三种人”嫌疑。

这位颇有创造性的记者，打造了宋彬彬走向“宋要武”阶梯上的最后一级。他的报道手法，很容易让人想起建国后新闻史上的诸多“经典名篇”。

#### 4、刘兰兰（音）

在1月4日的研讨会上，《记忆》主编吴迪说到了一个8·5参与殴打卞仲耘的人名：刘兰兰（音，或刘楠楠）。这是近年来唯一有人指名提到具体的“凶手”。

吴迪说，该女生初中在北京市第三女中，高中转入师大女附中，是军队干部子弟。根据校友们回忆，当天对卞仲耘的殴打中，一群“住在三军总部大院”的女学生是下手最重的，因为她们的学习不好，这时抓住机会表现。而刘兰兰又是其中出手最重者。据吴迪称，刘以后当了兵，文革后清查“三种人”运动中，她被“双开”，羁押起来准备审理，却由于赶上了孔丹给中央领导上书替“老红卫兵辩护”，一风吹从而过关。

在“谁是真凶”的问题上，先后涉及的还有数位领袖子女。但事后证明她们在8·5当天打死卞仲耘事件中并未卷入。

一个吊诡的现象是，围绕卞仲耘之死，师大女附中的校友们出版了多种著作，从不同立场进行了调查，譬如王友琴的《学生打老师的革命》和刘进、叶维丽、冯敬兰等人的调查。但这

些著作和调查结论中，没有一个人提及当天参与动手殴打卞仲耘的人名。

在叶维丽等人的讲述中，对于出手最重者的描述，往往用“一个瘦高个，一个大胖脸，文革前很出名”来描述，据说实际谁是打手已是公开的秘密。但不管是在调查结论和研讨会上，校友们仍旧不愿意讲出真名，理由是“追究真凶有多大意义”。另外一个原因则是，参与殴打的人众多，无从追究谁是祸首。冯敬兰最近发表的8·5事件综述中，也只是称其为刘某某。而吴迪提到的刘兰兰（音），就成了唯一一个若隐若现的名字。

问题是，如果一直不说出打人者的姓名，宋彬彬就一直难以卸去对“卞仲耘之死”的重负。

## 5、孔丹

孔丹因为近来和秦晓的“红二代骂仗”事件知名。他在文革中和宋彬彬同属于老红卫兵，同为不主张乱打人的“政策派”，8·18同时登上了天安门城楼，但没有直接联系。

1966年8月31日，孔丹再次登上天安门，或许是模仿宋彬彬，他当时给江青和林彪戴上了“西纠”红卫兵袖章之后，也想给毛泽东去戴，被周恩来阻止了。

孔丹在文革后的一次“上书”行为，影响了整个老红卫兵群体的命运，也间接埋下了宋彬彬在当下的争议。1984年，“老红卫兵”卷入了文革后开始的“三种人”清查，孔丹借助红二代身份给陈云上书，信中提出“老红卫兵”在文革中是坚决保护以刘邓为首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反对中央文革篡党夺权的，虽然在抄家破四旧中有过，但功大于过，和以打倒各级老干部为目标的造反派根本不同。这一理由显然说中了要害，获得了陈云等批示，老红卫兵就此解脱，还别列入接班人梯队。

但解脱老红卫兵的理由中，显然脱略了“红八月”在他们主导下的暴力伤害。前文已经说到，8·5事件中参与殴打卞仲耘的刘兰兰（音）本来可能遭遇审判，却由此过关。由于这一问题始终未能得到清理，多数老红卫兵获得前程的同时，类似“卞仲耘之死”的心理伤害却在发酵，历史和心灵欠账一直累积下来，由“宋要武”这样的符号化人物来承担。宋彬彬因而只好避居国外，2003年回国后也讳莫如深，一直走不出“宋要武”的阴影。

一直到眼下，终于由她和小鲁这样的“老红卫兵”出面来道歉清偿。虽云亡羊补牢，也难免积重难返。

对于宋彬彬的遭际来说，孔丹之上书，功耶罪耶，就如他和秦晓的“饭局骂仗”，是非只能扪心自问。

参考资料：

《对‘八五事件’的记忆与反思》，师大女附中刘进等校友编，2014年1月

《文革受难者》，王友琴，开放杂志出版社，2004

《学生打老师的革命》，王友琴，香港中文大学《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5年八月号

《难得本色任天然——孔丹口述史》，米鹤都编，中港传媒出版社，2013

□ 原载《网易真话频道》

~~~~~

【劫后反思】

## 良知的拷问（选载之二十）

• 孙怒涛 •

〔上接 Z k 1 3 1 0 a，第七章 4 1 4 的外战和内斗（1 9 6 7. 6—1 9 6 8. 9）〕

### 第二十五节 一席《多余的话》，引起我的强烈共鸣

每当发布毛泽东的最新最高指示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激动万分（到后来仅仅是显得有点激动万分）。刷大字报大标语表示热烈欢呼，那是最起码的行动。如果感觉重要一点的，与自己关心密切一点的，那就要开大会或者游行庆祝。现在看到许多宫廷电视剧，才知道那个时候皇帝下圣旨，百官和草民都要三呼万岁，与文革期间欢呼最高指示，其实也差不多是一回事儿。

最高指示，有时候是一句话，有时候是一段话。只要是毛泽东说的，我们就认真领会，坚决执行。正如林彪说的：“对毛主席的话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

但是，越到后来，有不少最高指示，怎么理解也理解不了。

毛泽东说：“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我们心里嘀咕：天天说形势“大好”，我们眼前怎么连“小好”也没看到呢？

毛泽东说：“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我们心里暗想：充分发动起来了的人民群众在做什么呢？打派战？打内战？都在搞革命没多少人在搞生产，这样的坐吃山空行吗？

毛泽东说：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们议论：这个“底”可真够深不可测的，究竟到哪一站才算是个“底”？开始说是几个月，后来说是1 9 6 8年春天结束，再后来说是搞三年。无边无沿，看不到底。

到1 9 6 7年的年底，对于那个我们曾经无限热爱、无限敬仰、无限崇拜的领袖，他的一句顶一万句的圣旨，我们已经开始敢于在二三个人的范围内议论了。

当我们在一起议论（有好几次是大礼堂开会前我们坐在台下议论）形势怎么一个大好时，傅正泰老师总是说，形势就是大好。我们请教他为什么说是大好，他就说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问他发动起来做什么了，他说搞文化大革命呀！再问他，他也不知道该答什么了。

傅正泰老师是个非常正直的老师。在我们眼里，他也是一个非常认真、天真、可爱、随和、与我们很谈得来的老师。他也是总部委员。不属于“东方红战团”也不属于“三七战团”，但是经常与我们“三七战团”的几个人混在一起，混得很熟。我们都很喜欢他。老师与学生的身份不同，他更多的是担心我们这些小将瞎议论最高指示会犯错误的。

后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 9 8 4年，傅正泰老师创办了海淀走读大学（现更名为北京城市学院），成功地开创了中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先河，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我在1 9 6 8年初，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接触到了一本小册子，是瞿秋白写的《多余的话》。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三任最高领导人。1935年红军长征时他被留在井冈山，后在福建长汀被国民党逮捕。在狱中他写下了《多余的话》，同年被杀害。

因《多余的话》，在文革前他被批判为晚节不保，在文革中更被指控为叛徒，他的墓碑被捣毁。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里说了好多绝非多余的话，深深地触动了我的心。

他说：“我其实是一个很平凡的文人，竟虚负了某某党的领袖的名声十来年，这不是‘历史的误会’，是什么呢？”

在清华，我也是一个极为普通的大学生。我也问自己，我当414的头头，是不是也是“历史的误会”？我各个时期的老师们、同学们还有乡亲们，要是得知我成了一名教授（那可是大学问家的称谓哦！），不会太惊奇的。因为我成绩向来不错，一直是个书蠹虫。但是我居然成了一个造反派头头，那是决计想象不到的。究竟是我自己想爬到这个位置，还是被群众运动的浪潮推到这个位置的？我觉得主要的因素还是后者。一个对政治感兴趣但是又没有把控能力，更没有从事政治所需要的素质和性格因而常常犯错误摔跟斗的人，原本应该去敲学问之门的，一不留神撞进了政治之门。这不是“历史的误会”又是什么？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袒露了他担任党的总书记这几年的心路心境：“一只羸弱的马拖着几千斤的辘重车，走上了险峻的山坡，一步步地往上爬，要往后退是不可能，要再往前去是实在不能胜任了。”

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拍案惊叹，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瞿秋白的这段话，所说出的，完全是我这个414头头此刻的心情，一模一样。我深感，414也像一辆千斤重的辘重车，我就是那匹羸弱负重的瘦马，险峻陡峭山路的一侧是万丈深渊，再往前拉我力不从心，想要后退定会粉身碎骨。

在我眼里，瞿秋白是一个文人，一个有良知、有才华的文人，一个向往光明、自由、美好社会的文人。他从一个热血青年成长为一个虔诚的革命者，但是，本质上，他适合像鲁迅那样的从文，不适合做职业革命家。历史的潮流把他推到总书记这一领导岗位上，成了革命领袖。这份职责他虽尽力而为，实在是勉为其难。《多余的话》写出了文人从政后复杂的心路历程。瞿秋白在就义前真实地、无情地剖析了自己，也剖析了他为之献身的主义。他的就义是那么的从容、淡定和勇敢。但是，在《多余的话》中流露出来用以自我解剖的真实而带点灰色的情绪被那些纯粹而又纯粹的“革命者”指责为晚节不保自首叛变的“铁证”。

我既没有瞿秋白那样的非凡才华，更没有瞿秋白那样的高尚情操。我不敢自比瞿秋白，但是我深感我的心与瞿秋白是相通的。我知道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很严重，摇摆性很大，没有坚强的革命意志。我知道自己的这些弱点但是又难以克服。我被《多余的话》所感染，被那种上又不能上、下也不敢下的两难所折磨。我看不到文革的前途，看不到414的前途，也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我估计或多或少有我这样情绪的人不是个别的，不是少数，而是相当普遍。对两派争斗厌倦，对文革前程看不到希望的人与日俱增，都在逐渐走向消极，趋于逍遥。

瞿秋白身患严重的肺结核，又不得不承担着那么大的政治责任，身心俱累。他坦然地把就义看成是一次“长休息”，镇定从容。我从1967年下半年以来，也深感体力不支，许多事情

已经无心过问，无力参与。我也一样感到躯体和精神的双重疲惫。

我也有点想当逍遥派了。这是文革开始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有了这样的念头。但是我不能。我既然推动着搞起了414，我就得对414负责。上虎背容易下虎背难。无论喜欢还是不喜欢，热爱还是不热爱，我都得继续留在414里，都得继续做414头头。这是一份责任。要是我现在去逍遥了，尽管别人阻挡不了，我的内心通不过。因为我觉得对不起414群众。正因为我此时的坚持已经不是靠信念、靠理想、靠热爱而是仅仅靠责任支撑着的，所以我的心就感到特别的累。

在这方面，沈如槐比我强多了。他的坚韧性，他的意志力，都远胜于我。这是让我不得不佩服的！

## 第二十六节 高校学习班，两派最后一次自我拯救的机会

1968年2月，又一次联合的机会降临到两派头上。只是这一次联合，是在414战歌事件、陈楚三被抓放以及1.4武斗以后，两派的关系中已经浸润了暴力和血腥，彼此之间有了仇和恨，互相间更加不信任了。可以这样说，大联合的基础更不如1967年9月份那次了。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北京市领导对联合紧迫性的认识和对还没有实现联合的两派压力达到空前的程度。

全国已经有一半多的省市自治区成立了革委会。“北京市18个区县已有16个成立了革委会”。2月13日，清华也进驻了海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促进两派的联合。

大形势、大环境都要求北京市还有一半多没有实现大联合的高校，特别是有巨大影响和示范作用的清华两派赶快联合起来，为建立革委会做准备。为此，北京市革委会决定分期分批开办“首都大专院校两大派革命群众组织负责人毛泽东思想学习班”（简称“北京高校学习班”），并于1968年2月5日正式开班。

“谢富治在动员大会上说：‘至于我们这个学校办多长时间，以解决问题为原则，什么时候解决问题什么时候算，先解决问题先毕业，后解决问题后毕业，不解决问题不毕业。’”可见这次上层真的是下足了力气，也抱着极大的希望。

清华的两派头头已经很难依靠自身的力量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学习和商谈了。好在这个时候已经有海军宣传队驻在学校，他们是学习班的主持人，斗私批修的宣传员，调解矛盾纠纷的和事佬。

团派参加学习班的有蒯大富、鲍长康、刘才堂、陈继芳、任传仲，414方面，沈如槐、陈楚三、汲鹏、刘万章，还有我参加了学习班。按要求，两派的主要头头应全部都参加。学习班在二里沟的新疆驻京办事处（后迁至北京市委党校）。学习、吃住都在学习班里，目的是与学校的派性活动尽量隔离。

2月4日下午，我们五个人为了表示继承革命老前辈的艰苦奋斗传统，决定背着背包步行去高校学习班。一路上有说有笑，兴致很高。回忆起414一年来的斗争，沈如槐说：“414刚成立时，总部里只有孙怒涛一个人。后来搞《四项协议》成立“革筹小组”时，22席中占了6席。到9月的“联合总部”中捞了一个7：6。如果这次搞联合，非得倒一个个儿不可。”我和汲鹏说：“能争个完全对等就不错了，要知足，别太好高骛远了。”沈如槐说：“老蒯怎么啦？非得独占一个席位？要算算账，他没干过一件好事。对等，是最起码的要求。”我们谈得眉飞色

舞，有点忘乎所以了。

因为团派始终不承认陈楚三是无罪释放，一直叫嚷着陈楚三是反革命，沈如槐认为如不彻底解决陈楚三的问题，大联合无从谈起，所以就让宿长忠留守学校，而让陈楚三参加学习班。我担心团派会不会死命反对。沈如槐说，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必须坚决顶住。

果然，团派头头看到陈楚三作为4 1 4的代表参加学习班要与他们一起学习，心里添堵，发表声明强烈抗议。抗议当然无效，因为人都释放了，事实上就是承认了陈楚三不是反革命。我发现团派的这些头头一看到陈楚三，眼神里全是恼怒，似有深仇大恨。但是又无可奈何，只能忿忿不平。除了学习、开会不得不在一起，平时吃饭、睡觉、活动、休息、闲谈，还是各派的圈子，互不掺和的。学习班在这样横眉怒目的气氛中开张，能是好兆头吗？我真不明白到这个时候团派还强词夺理说陈楚三是反革命，实在有点胡搅蛮缠不讲理。我也觉得如果4 1 4先不提陈楚三参加学习班的问题，等以后气氛和缓一些，在联合的过程中再提出陈楚三的问题，是不是会比较容易解决呢？难道要表现得这么强势就是为了显示自己的坚持原则不妥协不软弱吗？

学习班以斗私批修为武器，以批臭批倒派性为突破口。

如果说，第一次大联合的开始，双方还表现出相当的诚意的话，那么这一次为联合而举办的学习班，双方都没有什么诚意，也没有什么信心，只是为应付上面的压力。

所谓斗私批修，基本上都是斗对方的私批对方的修。斗自己的私批自己的修，那也是高高举起千斤重，轻轻落下三两轻。在自我批评的大旗下，含沙射影、旁敲侧击地批评对方才是真。

3 6所参加学习班的高校，确有几所高校实现了大联合。但是对大多数高校，效果不明显。尽管蒯大富、沈如槐有几次发言很感人，也做了比较实在的斗私批修，但是两派的对立情绪依旧，联合无实质性的进展。

有一天清晨，我们这些头头被海军宣传队一早叫起，说是学校里两派的大字报贴到学习班里来了，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求头头们把自家一派的大字报撕掉，撕干净，不留痕迹。

北京二三月份的清晨特别的寒冷。我们几个头头，哆哆嗦嗦地在新疆驻京办的外墙上撕着大字报。浆糊把大字报冻得严严实实的，很难撕，只能一点一点的扣。

“一缕阳光，几条汉子，贴着墙壁，手脚不停。他们在干什么勾当呢？原来都在擦自己这派的屁股。”我用怪里怪气的腔调随口胡诌着。于是有人调侃说，老孙，以后你要是写回忆录，倒是可以把这几句顺口溜写进去的。无心对话果成真，四十多年以后，我真的写在这里滥竽充字数了。

受过这遭罪以后，我们就严令“家里”以后不许再到学习班里贴大字报。

两派主要头头都进了封闭隔离的学习班，学校里两派都少了主心骨，派仗也没以前那么激烈了，但是暗底下对学校里派战的遥控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不过，由于海军宣传队居间不断地耐心做两派头头的工作，头头们看到大势所趋，通过一帮一、一对红等活动，两派之间的敌对情绪和缓了不少，慢慢地出现了比较平和的气氛。校内的不少基层单位实现了大联合，综合机械厂等单位甚至成立了革委会。参加高校学习班的北京



化工学院等几个学校也成立了革委会。形势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3月中旬，社会上出现一股以北大为首的倒谢风潮。虽然414对谢富治一直心存不满，也盼望着他的倒台，但是如果也跟着公开倒谢，认为有风险，怕中央枪打出头鸟，所以不准备赶这趟浑水。后来，倒谢风潮越闹越大，连团派都开始重炮猛轰谢富治了。414再不倒谢，又要成为保守派了，终于按捺不住，卷入到倒谢大潮中。因不敢公开喊“打倒谢富治”，就默许甚至鼓动下面的战斗组起来反谢。后来形势急转直下，倒台的不是谢富治，而是杨、余、傅。在这样的大形势下，学习班里的两派头头已经无法安心学习，都是心猿意马，想赶快回学校打派仗去。

这个学习班看来也受到高层的批评。主管学习班的李钟奇不得已做了只反派性，“没有抓紧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条道路的阶级斗争”[8]的检查。办了两个多月风波迭起的学习班，就这样虎头蛇尾，在4月19日草草收场。高层的政治斗争还在激烈进行，基层两派的联合是很难有实质性进展的。

4月23日，清华开始了百日武斗。5月30日，两派发生了死伤最惨重最血腥的大武斗。这以后，414伤亡严重，科学馆陷于绝境，屡次救援行为均告失败。我后来听接近沈如槐的老四讲，当时焦头烂额的沈如槐已经打定主意，只要把科学馆里的老四救出来，414就全体撤离清华，不跟蒯大富斗了。我在想，要是沈如槐能预见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那么他会在两派大联合中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以求联合吗？

7月27日，首都三万多名工人开进清华宣传毛泽东思想，制止武斗。团派开枪，造成震惊全国震动最高层的血案。此后，红卫兵运动退出文革的大舞台，蒯大富本人也由红卫兵领袖而一步步沦为阶下囚。我在想，要是蒯大富能预见到几个月以后的事情，那么他会在两派大联合中作出实质性的让步以求联合吗？

我想，要是真能预见到这一天，他们是会联合的。联合，即使两派自认为的核心利益受点损失，总比人员死伤要好得多，总比被强行同归于尽被逼着退出历史舞台要好得多，总比被隔离审查甚至判刑要好得多。

我们都不是高瞻远瞩的人。所以，这些“如果”也就是事后说说而已。

当局者迷。我们这些头头在当时为派别利益迷住了双眼，晕晕乎乎的。宝贵的两次大联合机会就这样从手指缝里溜走了，宝贵的时间就这样在内斗中白白地消耗掉了。回头再想想，万分的惋惜。

一切假设一切惋惜都没有用。历史的事实是，清华团四两派从分裂走向大规模武斗，最终同归于尽。

为什么两派的矛盾始终无法调和，最后走上这条不归路呢？

1、这是文革指导思想的必然结果。文革的指导思想是以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为核心的无产阶级专制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文革的主要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靠着毛泽东的极高权威和群众对他的绝对迷信，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很快就被攻陷了。如果文革只局限在上层，那么像历次政治运动和路线斗争一样，群众不会分裂成两大派。“走资派”本身就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可是可否、可多可少的。当文革的烈火烧向基层，哪些是走资派哪些是革命干部，群众很难分辨得清、很难正确界定。由干部问题又直接引伸出对十七年的评价问题。由上述所产生的分歧

形成两大派是必然的结果。可悲的是：无论是强调要砸烂旧清华的激进造反派团派还是强调十七年是红线主导的保守造反派 4 1 4 派，都认为自己才是毛泽东思想的忠实捍卫者，都视对方背离了毛泽东思想不可救药者，因而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2、这是中央两派斗争的必然反映。当年要是说中央存在两派，那是分裂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名。但是“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是公开的秘密。所谓“二月逆流”就是失去了权势的老帅副总理们代表“旧政府”向“新文革”们进行的一次拼死的抗争。4 1 4 的出现，也可以说是“二月逆流”在基层的反映。尤其是在“新文革”与“旧政府”间起着缓冲、纽带作用的周恩来，既紧紧跟随毛泽东、献媚江青，又时时心系“旧政府”、保护老家伙们。清华的团派听命于江青、谢富治等“新文革”，清华的 4 1 4 奉周恩来为精神后台，同情“旧政府”。清华两派斗争实质上是中央两派斗争在基层的典型反映。上有所动，下必有乱。

3、这是群体利益激化的必然结局。团派说，4 1 4 上台就是复辟旧清华。4 1 4 说，团派一统天下清华师生必遭其殃。总之，哪一派上台在对方的眼里都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在这华丽的外衣下，内心则是群体核心利益的考虑和捍卫。当群体以派别形式显现时，在派性的助推下，群体利益的激化变得更加不可调和。

4、这是鹰派掌权的必然后果。团派总部和 4 1 4 总部，基本上都是本派的鹰派占据着主导地位，鸽派仅起着牵制的辅助的作用。如果说 4 1 4 中的鸽派还有一个“三七战团”作为后盾的话，团派中的鸽派都是个体，连个依托的力量都没有，影响更加有限。鹰派的特点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最信奉斗争哲学，与对立派毫不妥协，而且政治能量极大。鹰派的政治敏感性极强，极善于扑捉和利用对方的错误，并以自己的过激反应为对方的反击提供口实和机会。由此，两派的冲突与争斗，犹如钱塘江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后浪盖过前浪。

5、这是两派势均力敌的必然趋势。如果两派的力量过于悬殊，可能只要一两个回合，胜负已定，不会旷日持久。团派在政治资源和物质资源上远胜于 4 1 4，在人数上也略多于 4 1 4，但是在士气上并不占多大优势。综合而言，4 1 4 虽处于在野和少数的不利地位，但与团派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团派要压垮 4 1 4，力量小了点。4 1 4 要反制团派是不可能的，但是要给团派制造点麻烦的能力是绰绰有余的。因此，团派与 4 1 4 的争斗是一场持久战。文斗时，是隔空的口诛笔伐，大字报大喇叭还骂不死人。一旦政治气候恶化，来一个“军事是政治的继续”，以武斗决定胜负，那种血腥程度就会超越想象而不可控制。

如果说，前面的三点是全国各地的造反派普遍分裂成两派的共同原因，那么 后面的二点可能就是清华两派由分裂走向武斗的重要因素了。

政治上定性错误，方法上处置极端，利益上不容妥协，这是团四两个群体的矛盾逐步激化至武斗对抗的惨痛教训。

（未完待续）

□ 摘自《良知的拷问》（香港）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 2 0 1 3 年 2 月第一版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 0 2 1 - 8 6 0 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